编者按：

社会管理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日益凸显其挑战性、紧迫性，也适时地摆在了中央高层的决策案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今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如何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新体制、新机制？为此，本报特别刊发一组来自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采访报道，请他们从各自岗位出发，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以飨读者。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

社会管理要纳入考核指标

“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国家对民生工程投入越来越大，为什么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管理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必须把社会管理纳入党政干部政绩考核指标”。郑小燕认为，只有把“软指标”变成“硬指标”，才能缓解社会管理的各种矛盾。

郑小燕坦言，现在的地方官不好做，既要出政绩，又要搞民生，而精力和财力都是有限的。政绩考核如同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政绩考核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行政施政方式。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层在市县两级，政绩考核的主要对象是市县两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现行的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地方领导干部政绩的体系存在很多弊端，致使“干部出数字，数字干部”、“借债搞政绩工程”等现象屡见不鲜。

“由于市县考核中参观考察大多看表面东西，因而出现了很多虚假的政绩工程。比如搞工程、搞项目、修广场、建大楼等等。短期内将人均GDP拉上去了，那百姓的收益在哪里？由于办公大楼、大厦、广场等显眼的形象工程开工建设太多，耗费财政巨大，致使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民生工程投入薄弱。老百姓自然怨言不断。”郑小燕快人快语，非常不客气的指出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现在，中央和省（直辖市）的各部门都要求自己所管辖的地县各部门实行“一把手”负责制。而各个上级部门下达的目标太多，各种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甚至有一些目标根本是达不到的。这样的考核，或者是太繁杂，无法实行，或者是指标达不到。

“群发事件绝大部分发生在基层。百姓的焦点在哪里？”郑小燕举例说：“有些上访的老百姓并不是非要拿到一个结果，只是一个态度而已。而我们的基层管理者却欠缺这一块。”

她介绍，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改善接访条件、倾听百姓呼声，2008年11月16日，江西省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暨“和谐大厦”正式建成启用。

“自从和谐大厦投入使用以来，我每天上班都要从那里路过，发现原来围在信访中心的不再出现上访人群。说明这项畅通信访渠道、改善接访条件、服务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已取得很大的成效。”郑小燕介绍，大楼内设有省领导、政法系统领导接访室，职能厅局长接访室，18个分类接访室及11个设区市接访室，还具备了办信、网上投诉、人民建议征集、省长手机信箱、应急处置等多种功能，并配置了接待宣传服务、视频远程接访、电话语音、计算机网络通信、协同办公、安全监控等系统，可同时接待600余人来访。由省领导带头包案下访，厅局长定期到信访部门接访……为老百姓解决了一大批实际困难和问题，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郑小燕还提到，近3年来，江西逐渐弱化GDP考核，“尽管江西的经济并不是很发达，但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差距大大缩短，良好的地理环境优势逐步凸显。因此，江西省委、省政府决定把更多的财政收入投放到民生工程中。去年，民生工程投入额占到财政总收入的55%，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生态移民：圆山区孩子的上学梦

3月2日，宁夏同心县生态移民村南安村南安小学的学生在整队放学。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南安村的南安小学成立于2009年，是一所生态移民学校。目前，学校内有6个年级共530余名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的田老庄、预旺、张家塬等大山深处的小乡村。自从跟随父母移民到南安村之后，这些孩子就再也不用每天赶40多分钟的山路去上学了。更多的山区孩子坐进宽敞明亮的教室，接受义务教育，圆了自己的上学梦。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全国人大代表、银川市市长王儒贵建议：

组建社会警察局 实行综合执法

“社会管理与公安依法管理中间有缝隙，这里既有法律不健全的问题，也有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同时，还有一些令老百姓很生气，公安来了又没办法，仅靠道德谴责根本就不灵的事情。”全国人大代表、银川市市长王儒贵建议，创新社会管理，组建社会警察管理局，实行综合执法，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他说，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所有行政法律法规均由各级各行政部门作为执法主体负责组织实施，各级各行政部门普遍设立若干执法机构具体负责1部至2部法规的实施。在这种执法模式下，队伍很多，人员不少，但每支队伍的力量都很有限，难以有效覆盖全社会，导致执法成本很高，执法效率不高，许多法律法规难以得到有效实施，社会秩序没能得到有效维护。

“比如，一个驾驶员要到某小区办事，没有小区停车卡，把车停在小区外边的出口处。交警没法管，车未停在马路上；城管说，在小区门口，没法管；而物业又没有执法权，这个驾驶员可以把车毫无顾忌24小时停在小区门口，给小区居民带来了很多不便。”随时随地体察民情、把暗访当习惯，常在马路边、出租车上、闹市区、公园晨练中被人们认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既要管百姓的针头线脑，又要主政银川的谋划。

日常城市管理中，公安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虽然在职能上重复交叉，可以相互结合、补充，可实际上却壁垒森严。如街头发生的乱摆乱卖、乱贴乱画等违法行为是城管处理，警察不理；“两抢”、扒窃、治安纠纷等是警察处理，城管不理；而交通违章则是交警处理，治安警不理。部门之间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城市管理现状，造成极大的警力和执法资源浪费。实际上，城管执法人员做的很多工作相当于警察，大量的城管类违法行为也可以定性为触犯治安管理类法律。

2002年以来，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全国多个市、县在城市管理领域进行综合执法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城管综合执法队伍组织架构混乱，没有统一的中央、省级机构对其进行有效指导、管理和监督，执法人员身份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统一服装，执法水平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多顶‘大盖帽’管不了一顶‘破草帽’，而且各种各样穿制服的‘大盖帽’我有时都分不清，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王儒贵说，因此，要把众多的“大盖帽”集中到一起，组建成一个“大盖帽”，群众关心反映的问题将不会再被多个部门来回“踢皮球”。

他提议，为了提高执法效率，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在目前公安系统社区民警、治安警和部分巡警、交警的基础上，整合城管综合执法队伍及其他行政执法队伍，组建社会警察局，实行综合执法，建立以巡逻执法为基本方式的动态、高效、主动的城市管理模式。

在行政处罚权集中的同时，对涉及到的现有各领域的执法人员，按照吸收人民警察的规定通过培训、考试，予以收编。

由社会警察统一负责社会上的执法事务，处理社会上发生的违法行为，可以整合执法资源，节约执法成本，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法律的执行力和社会有序化水平。

王儒贵强调，社会管理警察，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政为民”、“法治精神”的立足点，将城市管理执法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能够行使法定强制权力的社会管理警察，不可能也不必要再通过暴力化的举动进行管理。这不仅能有效解决目前城市管理执法中暴力抗法事件频发、城管制度严重违反法治精神等问题，使城市管理制度更加理性，使广大公众对城管执法队伍的反感甚至敌视情绪逐渐消失，同时也与国际接轨，能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王生博士：

社会管理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当前社会发展矛盾与机遇并存，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强和提高社会管理工作，必须要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王生博士认为，诚信体系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之根本。

他认为，要全面推进我国诚信体系建设，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对策，全面提高社会的诚信水平，防止失信带来的危害，夯实经济社会长期、快速、稳健发展的基础。要把政府、企业、个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参与模式，大力实施诚信工程，着力构筑社会诚信体系，努力创建和谐社会。

“要加强社会管理，首先要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引领社会文明新风。社会的诚信首先是政府的诚信，诚信政府是诚信社会的定心丸，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政府的诚信。对公众的庄严承诺，必须一抓到底，落实到位。要提高执政透明度，实施好‘阳光工程’。要大胆地做一些改善民生、有利于发展的实事好事，取信于民。塑造诚信政府的重点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强领导干部诚信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王生博士认为，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政府不讲诚信的事时有发生，如政出多门、政令不畅、朝令夕改、政绩工程等。它既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地方投资建设环境，又给社会和基层群众带来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执政为民，只有政府的诚信加强了，百姓从心底有了依靠，社会管理问题便会有更多的创新。”王生博士说。

他表示，由于信用法规体系不完善，商业信用基础不牢，经济领域的失信事件屡屡发生。市场参与者只关注其短期经济价值和个体利益，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商业行为非常不规范，虚假广告广泛传播，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不讲信用的事件层出不穷。如毒奶粉事件、“皮革奶粉”事件、假药假疫苗事件、食品违规使用添加剂事件等。

首先建立诚信体系。一要建立各行各业信用系统。健全统一的信用信息网络，开通信用信息公开查询系统。二要构建信用评价体系。对各行各业特别是市场主体的信用风险进行科学评级，确定信用等级，建立审慎的信用评价制度。三要实行信息透明公开。要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对外公开各行各业的诚信等有关情况，使信用中介机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能够及时获得有关信息，形成有效的公众、媒体监督机制。

其次，强化诚信奖惩机制。一要发挥诚信的正向激励作用。对诚实守信的行业和从业人员进行适当的奖励，促使市场主体严格按合同办事，全面履行业务职责，形成良好的诚信风尚。二要严厉惩处市场主体的失信行为，发挥法治对失信行为的惩戒作用。三要建立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发挥行为协会的自律作用，建立行业内纠纷处理机制，及时快速处理有关纠纷和争执。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书记史少林：

新疆社会管理应更加多元化

“社会管理最近几年被中央提到议事日程，这是时代的进步。”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州）党委书记史少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疆与多个国家接壤，邻国往往是通过新疆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因此，新疆的社会管理除了拥有内地的共性外，还因多民族、多文化显得更加复杂化、多元化，也便有了更深的含义、更特殊的使命。”

维语与汉语一样流利，且自由转换的史少林，对新疆的社会管理显然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实践。

“只要有社会就有管理。在传统的意识中，一提到社会管理，就有一种对立、管理者居高临下的感觉，认为那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概念，是硬性的、粗放型的。”祖籍陕西，作为第二代援疆干部，史少林认为，“现在提出社会管理，是时代的进步，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管理是服务，是柔性的、和谐的、成熟的，不是硬性的、更不是强制的。各级党政干部、公务员必须转变观念。”史少林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是对党政干部执政能力的考验。公务员必须转换角色，改变一提“管理”，就得分高低上下的理念。

怎么管？

“老百姓已经提出管理的要求，按照老百姓的要求去做，想想如何为老百姓服务，就是社会管理。”公务员必须不断地学习、吸收新的社会知识，提升管理能力，进行人性化的管理，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管理的进步性。”史少林认为，把科学发展观精神实实在在地贯彻到社会管理中，落实到民生工作中去，是新时期党政干部必须面对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把2011年确定为“民生建设年”，推出“22项重点民生实事工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和付出。史少林说，2010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达23.3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74.2%，是博州历史上财政投入最大、群众受益面最广的一年。目前，博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7130元，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达到25910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宅面积达26.75平方米、28.05平方米，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3.8%以内，教育支出超过国家法定教育支出比重两个百分点。

有数据显示，在2010年度自治区公众安全感及对政法综治工作满意度调查中，博州在全疆排名第三，这说明各族群众的社会安全指数、民生幸福指数都有了明显提高。博州“十二五”发展的目标中有一个核心指标：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走在全疆前列。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由白雪、李玲玲采访整理